

和谈、内战交响曲

——毛泽东赴海外石西迁就胜利初期



孙其明●上海人民出版社

92
K266
1
2

和谈、内战交响曲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

孙 其 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B

966148

(沪)新登字 101 号

特约编辑 周尚文
责任编辑 郝盛潮
封面装帧 杨德鸿

和谈、内战交响曲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

孙其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州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 插页 5 字数 370,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203-01394-2/K·334

定价 7.10 元

卷首语

近几年来，史学著作的出版、发行不甚景气，而以历史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小说及其他文艺作品却很风行，笔者因此产生了一个念头，能否用比较通俗、生动的语言和比较活泼的表现形式，写出一本历史书来。

这样的历史书，首先应忠实于历史，对所写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哪怕是十分具体的情节，都不能无根据地“虚构”与“创造”，以区别于性质不同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同时，它又要学习文艺作品的长处，摒弃讲义式的语言和呆板、教条的表现形式，把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生动而又丰富的内容表达出来，使读者也象读文艺作品一样兴趣盎然。

这本书，就是笔者为实现上述愿望而作的一种尝试。由于笔者缺乏这方面的写作经验，又受到自身水平的限制，写出来的东西未必能完全如愿，不足之处势所难免。但笔者自信，主观上是努力去做的。

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写抗战胜利之初，即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至1947年3月国共完全破裂，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之间，展开的一场极为错综复杂的较量。

由于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原因，笔者对这一段历史颇感兴趣。这段历史时间虽短，但对战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重大，多年来我国史学界对它的研究

却权不充分。以往的各种著作提到这段历史时，大多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或只是重复一些简单化的论断。因此，不仅许多青年人不了解历史的真相，即便是亲身经历者，因受到各种局限，也难窥这段历史的全貌。

本书的宗旨，就是要尽可能忠实而全面地反映这段历史，展现当时的国际关系对中国国内斗争的影响，为读者寻求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答案提供思索的材料，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更好地了解过去，并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马洪武、王德宝同志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郝盛潮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已出版的许多著作、回忆录和史料汇编，并利用了其中的不少成果，在此也一并向所有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方便的著者、编者致谢。

孙其明

1991年8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唇枪舌战的四十三天	1
两个宿敌的再次握手.....	1
一石激起千层浪.....	7
蒋介石连发三份邀请电.....	11
“假戏真做”与“将计就计”.....	17
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	26
历史不应忘记.....	30
难产的《双十协定》.....	41
中共的统战“阴谋”.....	57
第二章 “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65
一份绝密电报.....	65
阎老西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70
新的黄粱美梦.....	77
陷于僵局的谈判.....	85
四个人倒下去，四万万人站起来	100
第三章 关键的一着棋	118
三国四方的竞技场.....	118
延安与莫斯科的微妙关系.....	129
十万大军闯关东.....	146

所谓的“外交接收”	158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70
第四章 昙花一现的和平	185
马歇尔、杜鲁门、赫尔利	185
白宫修补对华政策	198
第一个成果	207
民主的曙光	220
张治中三到延安	230
第五章 火药桶在关外爆炸	247
不祥的预兆	247
不起作用的东北停战协定	257
东北的“马德里”之战	267
一着走错,满盘皆输	276
流产的休战谈判	287
山雨欲来风满楼	296
第六章 不宣而战的大战	308
战幕首先在中原拉开	308
铁老虎,还是纸老虎	317
粟裕将军立了头功	326
刘伯承活捉赵锡田	336
陈赓与胡宗南	346
蒋介石巧用傅作义	355
第七章 硝烟弥漫中的“和谈”	366

和平的旗号不能丢·····	367
司徒雷登没有创造奇迹·····	373
马歇尔的银样蜡枪头·····	386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396
死马当作活马医·····	411
最后一幕闹剧·····	418
第八章 玩火者必自焚·····	431
黑土地上战火再起·····	431
延安的新方针·····	438
卧榻之旁的拚搏·····	448
“二陈”决战在华东·····	456
祸不单行 咎由自取·····	465
马歇尔悄然离华·····	477
蒋介石孤注一掷·····	487
历史的启示·····	497

第一章 唇枪舌战的四十三天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抗战的漫漫长夜里，中国人民曾象盼星星、盼月亮那样地盼望胜利。现在，胜利已经到手，人们又象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盼望和平幸福的生活。

然而，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却令人失望。人们脸上欢庆胜利的泪水尚未擦干，天空中又出现了内战的阴云。

旧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但中国的前途未卜，仍处在十字路口。

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当时国内两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亿万中国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重庆和延安。

两个宿敌的再次握手

1945年8月28日。

在陪都重庆的九龙坡机场上，聚集着几百个人。他们全然不顾当空的烈日和难忍的暑气，频频地翘首仰望碧空，等着欢迎来自远方的几位客人。

机场上没有口号，没有鲜花，也没有仪仗队，但从大多数欢迎者脸上那喜悦而肃然的表情仍可看出，即将光临的客人绝非平常人物。

下午三点半钟过后，晴空中终于响起了马达的轰鸣，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飞机进入了人们的眼帘，机场上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

“看！这就是赫尔利大使的专机。他们来了。”

“啊！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安全到达了！”

伴随着人们的话音，飞机缓缓着陆。不一会，便停驻欢迎人群的面前。机舱门打开了，几位客人先后出现在舱门口，一面向欢迎的人群招手，一面稳步地走下飞机。

“瞧！他就是毛泽东！你看清了没有？”

“看清了，看清了！毛先生与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好认，好认！”

人们没有认错。头一个走下飞机的客人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只见他头戴一顶灰色的拿破仑帽，身穿一件宽大的蓝灰布中山装，脚登一双黑色牛皮鞋，身材魁伟，神采奕奕。他一走出飞机，机场上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则微笑着，频频向机场上的人群招手。

紧随着毛泽东走下飞机的，是中共代表团的另外两名成员，周恩来和王若飞。自抗战以来，周恩来和王若飞先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重庆，所以，陪都的各界人士对他们都很熟悉。今天，周恩来仍穿着一件他过去常穿的浅色中山服，左腋下夹着一个纸包，右手则不停地举起来，笑容满面地与欢迎的人群打招呼。王若飞的身材与周恩来相差不多，也穿一件浅色中山装。抗战胜利前夕，他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现在，不到两个月，他又随着毛泽东来到了陪都。

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时走出舱门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身穿西装、头戴礼帽，个子比毛泽东还高半个头的

赫尔利，今天也显得特别高兴，他一面沿着扶梯往下走，一面不停地向人们招手。张治中则与别人不同。唯有他穿的是一身戎装，脸上的表情也显得比别人严肃。为了迎接毛泽东来渝，蒋介石派他与赫尔利一起，于昨日专程飞往延安。他深知此行责任重大，不敢懈怠。今天，他终于把毛泽东等人顺利、安全地接到了重庆，犹如一块石头落地，他的心情已觉轻松得多了。

毛泽东等人刚一踏上山城大地，欢迎的人群便朝他们涌去。跑得最快的当然是那些抢新闻的中外记者们。他们抢先将毛泽东等人围在中间，手上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有的记者一边拍照，一边对赫尔利喊道：“站近一点，大使先生！”赫尔利也被这些记者逗乐了，兴奋地对站在身旁的毛泽东说道：“好莱坞！好莱坞！”

摄影竞赛持续了好几分钟，可把其他的欢迎者急坏了。他们被挡在记者组成的人墙外，无法接近毛泽东。身材矮小、年迈体弱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用尽了力气，焦急地不停地喊道：“我是沈钧儒，请让一下！”

机警的周恩来看到了这种情景，心生一计。只见他一面敏捷地将腋下夹着的一个大纸包举到空中，一面大声地对记者们喊道：“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边来拿吧！”

这一着，果然有效。围着毛泽东的记者们立即被吸引过来。这时，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周至柔、邵力子、雷震和民主人士沈钧儒、张澜、郭沫若、黄炎培等人才得以走到毛泽东的身边，与他握手、交谈。这边，周恩来微笑着向记者们分发“礼物”。记者们打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的书面谈话稿，于是满意地赶进城里抢发新闻去了。

大约半小时以后，机场上的欢迎场面才告结束。毛泽东、周恩

来、王若飞等三位客人，被赫尔利、张治中送往曾家岩桂园小憩。

位于重庆市区中四路的桂园，原是张治中的住宅，故又称张公馆。在得知毛泽东决定来渝之后，张治中一家便暂时搬迁出去，将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使用。在渝期间，毛泽东大多住在化龙桥红岩村13号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但红岩离市区较远，接见各界朋友不太方便，而桂园则方便得多。因此，桂园后来便成为毛泽东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天早上八时左右，毛泽东从红岩乘车到桂园，在这里办公和会客。下午六时左右，再从桂园乘车回到红岩休息。

8月28日这一天，桂园则成了毛泽东飞抵重庆后的第一个落脚之处。也许是长期住窑洞，多年生活在贫困的山区、农村的缘故，毛泽东对桂园客厅里的广漆地板和典雅的陈设似乎感到很不习惯。喝茶时，一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

在桂园张公馆用过午餐和稍事停留之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驱车来到红岩村13号，与早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党内同志会面。（1）

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山坡上，13号则是一幢不大的三层楼房的建筑。它的公开名称是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实际上，领导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因此，它的地方虽小，却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部和大本营。党的领袖毛泽东要来重庆的消息给在这里工作的同志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为了给毛主席安排吃、住和警卫，他们已紧张而兴奋地忙碌了好几天。现在，毛主席真的来了，整个办事处顿时变得比过年过节还要热闹。毛主席一到，所有在南方局、办事处工作的同志，还有专门从城里赶来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工作人员便齐集到办事处的小礼堂，开了一个小型欢迎会。会议时间虽短，气

氛却十分热烈。初到重庆，一时还不太习惯的毛泽东此刻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顿觉轻松多了。

毛泽东在红岩只停留了二、三个小时，便又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应邀乘车前往蒋介石的别墅——山洞林园赴宴，并同蒋介石会面。

山洞林园地处重庆市郊歌乐山区，原是川军一个军官的私宅。抗战中，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此宅即被占用，成为蒋介石在重庆市郊的别墅之一。园内共建有四幢三楼三底的西式洋房，洋房的四周均为花圃、草地、松林所环抱，十分清静、雅致。蒋介石住的是一号楼，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则住四号楼。不过，林森已于1943年因车祸丧生。因此，抗战胜利前后，除了蒋介石和他的侍卫人员外，林园内已没有别人居住。在得知毛泽东决定来重庆之后，为了表示殷情，蒋介石下令将园内二号楼腾扫干净，作为毛泽东在重庆的下榻之处。8月28日，蒋介石就在这里给毛泽东接风洗尘。

当天晚上八点多钟，毛泽东一行来到山洞林园。蒋介石带着随从，在一号楼前迎接。当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走下汽车时，蒋介石赶紧迎了上去，满面笑容地和毛泽东握手、寒暄。

“润芝，你好！我们有十几年未见面了吧？”蒋介石首先开口。

“蒋先生好！是的，我们今天是久别重逢，实在令人高兴。”毛泽东回答说。

“欢迎润芝到重庆来！希望你多住些日子，我们好好地谈一谈。”

“感谢蒋先生的好意，还请蒋先生多多赐教！”

这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幕。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

这是在阔别了十九年之后，中国两个最大政党的领袖，也是两个宿敌的再一次握手。

客人们被引进客厅就座。旋即，宴会正式开始。应邀出席作陪的，除国民党政府的大员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等人外，还有赫尔利大使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宴席上，酒菜之丰盛自不别说，气氛也十分热烈。据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说：“席间蒋主席和毛泽东同志曾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

宴会结束后，在蒋介石的力邀下，毛泽东、周恩来即下榻于林园二号楼。他们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8月30日才搬到红岩村居住。

毛泽东飞抵重庆，并与蒋介石握手、欢宴这一重要消息，很快便通过无线电波，通过各种新闻媒介，传遍了整个山城，传遍了全中国，也传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为毛泽东亲临重庆而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他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

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8月29日的社评中写道：“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成都《华西晚报》29日的社评则认为，毛泽东飞抵重庆，“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论讲得更为情深意切：“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已于昨日与赫尔利大使及张治中部长同机飞抵重庆。这好象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以后，这真是最令人兴奋的消息。”（2）

类似的评论，在当时的报刊上多得不胜枚举。

这些话，不但表达了大多数中国人因毛泽东飞赴重庆而发自内心的喜悦，也反映出人们对即将举行的国共和谈异乎寻常的关注和重视。

几十年来，中国大地上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如今，国共两党领袖能坐在一起谈判，确是一件大事。“人心思和”，善良的人们怎么能不翘首以待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

半个多月前，即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古老的神州大地立即沸腾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景象。经历了罕见的劫难和巨大的牺牲，与日寇整整拚杀了八年之久的亿万中国人民惊喜若狂，用各种方式表达胜利的喜悦。

在陪都重庆，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人空巷。人们如醉如痴地涌上街头，狂欢庆贺。

在革命圣地延安，新华社的译电员一路奔跑呼号，很快将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每一个窑洞。大街上立即出现了自发的庆祝集会。卖水果的农民把成筐的红花果抛向天空，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学校的学生们把棉袄撕破，掏出棉花扎在棍子上，蘸上煤油点起火把，到大街上游行。

在东北，长期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三省人民，十四年的积怨也一下子倾泻出来。他们走上街头，将侵略者为自己“歌功颂德”的铜像推翻在地，砍掉脑袋。他们撕下沾满中国人民血泪的太阳旗，让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

由于胜利，人们都在庆幸，苦难总算熬到了头，和平可以实

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人们脸上那激动的泪水还未擦干，天空中却又出现了乌云。内战的阴影再一次笼罩了全中国，亿万人民祈求多年的和平仿佛又要成为泡影，希望眼看又要变成失望。

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还来不及品评这“胜利”的滋味时，蒋介石就把一盆冷水浇到了人们的头上。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给他的嫡系部队，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蒋介石是要自己的嫡系部队垄断接受日军投降的大权，而不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收缴日伪的武器装备，收复失地。一句话，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竟然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还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如日伪驻地被中共部队攻占，日军应负责“将其收回”。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还发表谈话，指责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所发限期日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

蒋介石发布这样的命令，不许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投降，是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坚持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的必然产物。在蒋介石看来，如果让中共接受日伪投降，无疑是给中共一个扩大解放区，发展革命武装的好机会，必然使中共迅速“坐大”。而这正是蒋介石最担心，最头疼的事。他一向认为共产党就是自己的主要对手，是必须予以消灭的目标。既然如此，他怎么能让中共借接受日伪投降之机进一步发展壮大呢？

据说，日本刚一表示乞降，蒋介石便开始策划受降之事。他曾让军委会、军政部拟出受降接收人员名单。名单拟好后，由当

时分别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二处主任的林蔚、陈布雷把它呈送给蒋介石审阅。他看到名单上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心里很不高兴，不加思索地拿起红铅笔，将其划掉。林蔚、陈布雷却不以为然，遂婉转地劝道：“先生，中共代表只有一人，加上为好，这样对内对外也可说得过去。”可蒋介石并不理睬他们的建议，反而沉着脸说：“先让朱德待命好了……”林蔚、陈布雷不敢再劝，但一走出蒋介石的办公室，陈布雷立即嘟囔起来：“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弄巧成拙……”（3）

蒋介石自以为自己一纸命令就可以阻止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他万万没有想到，上述两个互相矛盾，又十分荒唐的命令一发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俗话说：一石激起千层浪。

蒋介石不许曾和日伪军进行了八年殊死战斗、作出过巨大牺牲的敌后解放区军民接受日伪军投降，反而命令日伪军继续抵抗八路军、新四军。这无异于认敌为友、反友为敌。中共及解放区军民当然不能忍气吞声，理所当然地拒绝蒋介石的反动命令。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指出：

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4）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共的立场和态度。8月13日